

“冷战”视角下的中美“新冷战”^{*}

黄忠

【内容提要】 国内外有关中美“新冷战”的争论忽略了对“冷战”本身的回顾，观点难以经受住历史检验。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当前的中美关系特征不符合冷战的基本特征，内容不满足冷战的含义，发展更不具备冷战诞生所必需的条件。二战结束之初，国际体系权力真空与混乱为两极结构下的冲突与对抗提供了足够空间，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冲突不可调和令美苏走向对抗，意识形态对立、文化心理认知差异强化了苏美决策层的恶性互动，这三者共同导致了美苏冷战的产生。当前，两极结构远未形成，国际权力真空极小，中美经济、政治与安全层面利益冲突并非不可调和，意识形态与文化差异上的认识问题也不是无解，这决定了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将很难发生。确切而言，中美正处于“类冷战”的战略竞合期，它受到了美国冷战思维的影响，负面色彩比较突出。拜登政府继续对华施压，第三方问题引爆两国危机可能性的提升，尤其是美国政治的极化与分裂，决定了未来中美关系有可能更差。对此，中国应继续以发展自己为首务，对美坚持以斗争求合作的方针，争取早日实现国家崛起。

【关键词】 中美关系；新冷战；冷战；类冷战

【作者简介】 黄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讲师，阐释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广州 邮编：510420）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22.02.004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22）02-0076-24

^{*}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近年来美国全球软遏制战略变化与中国对策研究”（20BGJ058）资助成果。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随着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在政治、经济、安全与人文交流等领域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对抗行为，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与此同时，鉴于中国经济实力迅速上升并且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超越美国的前景，有关崛起国是否会挑战霸权国进而导致双方关系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争论一度引起热议。在此背景下，关于中美两国新冷战（New Cold War）的研究正在成为热点。然而，相关讨论专注于当下，冷战爆发的真实历史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相应的比较分析也没有跟上。由此导致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研究犹如无根青萍，难以通过比照历史对当下的中美关系现状与发展前景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也无法从当年美苏陷入冷战的悲剧中有效吸取经验教训。本文旨在就此做出初步探索。

一、国内外有关中美“新冷战”的争论

在有关中美新冷战的议题上，学术界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是否已经进入新冷战，如果没有，那么它发展成新冷战的可能性有多大。

诸多人士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新冷战或者朝着新冷战的方向走。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无疑是美国政界相应看法的代表，他甚至认为中国对于西方的威胁要大于冷战时期的苏联，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已经以苏联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进我们的经济、政治与社会”。^①在阿兰·杜邦（Alan Dupont）看来，中美两国的对抗已经具备了冷战特征，其重要差别在于美苏对抗主要在政治军事领域，中美对抗则主要是经济上的，即以贸易、投资、技术和战略工业为中心。他认为，虽然这种冷战在程度上虽没达到“冰冷的高原”，但已处于“山脊上”。^②提摩什·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主张，应该承认中美已处于新冷战中，因为它符合之前冷战的核心特征，即范围的世界性、领域的多维度性以及时间的长期性。^③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中美两国在2019年正式进入冷战，并且这场冷战“会变得更冷”，原因是这一

① “Pompeo: Chinese Threat May Be Worse than a ‘Cold War 2.0,’” *Politico*, August 12, 2020,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8/12/pompeo-chinese-threat-may-be-worse-than-cold-war-communism-394350>.

② Alan Dupont, “The US-China Cold War Has Already Started,” *The Diplomat*, July 8,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7/the-us-china-cold-war-has-already-started/>.

③ Timothy Garton Ash, “The US and China Are Entering a New Cold War. Where Does that Leave the Rest of Us?” *The Guardian*, June 20,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jun/20/us-china-cold-war-liberal-de>.

年特朗普采取的对华对抗政策得到了美国两党精英的有效支持，不仅如此，这一年双方在贸易上的针锋相对还迅速蔓延至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领域。^①约翰·肯普（John Kemp）则将2020年视为中美正式进入新冷战的时间，他说，“超级大国都表达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和几乎没有共同利益之处。双方都试图将第三国推进一个能将世界分割成两个脱钩集团的联盟体系，即红色对抗蓝色，和我们一起或反对我们。这种完全对抗符合冷战的定义。”他断言，之前的中美冷战已经有数年踪迹可寻，只是在2020年达到量和质的爆发点而已。^②在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直指美国一些政治势力试图将两国关系推向新冷战。^③有问卷调查显示，62%的中国学者认为美国真的在对华发动新冷战。^④田飞龙称中美当前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与意识形态战“已经逐步构成了除直接热战之外的冷战谱系”，它是“一种充满国际政治敌意与文明冲突内涵的全面性对抗和竞争”。^⑤在张沱生看来，当前中美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与摩擦加剧，如果冲突发生，则无论其程度如何，它都会为另外一场旷日持久的冷战打开大门。^⑥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反对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或者有进入新冷战的可能。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拒绝了中美正在进入新冷战的说法，表示美国的目标并非遏制中国、压制中国发展，不要求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⑦理查德·丰塔涅（Richard Fontaine）和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指出，当前中美对抗并非另一场冷战，它不具备冷战的特征，比如存在军事集团之间的对抗。不仅如此，几乎美国所有的盟友非

① Niall Ferguson, “The New Cold War? It’s With China, and It Has Already Begu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2019,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1204/china-cold-war/>.

② John Kemp,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Enter a New Cold War: Kemp,” Reuters, May 10,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global-politics-kemp-column-idUSKCN24N1MT>.

③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新华网，2020年5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lh/2020-05/24/c_139083738.htm。

④ 杨云涛、张婷婷：《人大重阳问卷调查百名中国学者，九成受访者相信：中国能应对好美国“新冷战”攻势》，环球网，2020年7月7日，<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KrKap>。

⑤ 田飞龙：《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美新冷战、西方缺失与世界秩序重构》，《党政研究》2021年第2期，第83页。

⑥ Zhang Tuosheng, “Avoiding a New Cold War,” *China-US Focus*, August 19, 2020, <https://www.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avoiding-a-new-cold-war>.

⑦ Norah O’Donnell,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on the Threat Posed by China,” *CBS News*, May 2, 2021, <https://www.cbsnews.com/news/antony-blinken-60-minutes-2021-05-02/>; Katrina Manson, “Blinken Rejects Claims of ‘Cold War’ Between US and China,” *Financial Times*, May 5,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f77604cd-cb6b-45df-a9ec-4f4b63959ad5>.

但不愿与中国全面对抗，还希望在安全和经济利益上于中美之间左右逢源。^①尼克·比斯利（Nick Bisley）强调，即便中美竞争按照当前轨迹走，其结果也不会是冷战，虽然它有可能更复杂，更难管理且持续时间要长得多。^②郭树勇等认为，中美冷战的发生只是一个“神话”，原因是它不具备政治、经济基础，中美双方有足够的危机控制经验同时也更有自制力，等等。^③李巍认为，当前中美处于“准冷战”状态，类似于1946～1947年间的苏美关系。它不符合冷战三大核心特征，即国际体系中存在两个足以匹敌的极点大国，这两个大国之间是竞争而非伙伴关系，它们之间没有直接军事对抗。当前中美关系的前景具有不确定性，它不仅取决于两国决策者的选择，而且与两国精英与公众认知攸关。^④薛力主张，中美关系不是“新冷战”，而是“冷缠斗”，即一种利益互相纠缠的角力。美国无意再次发动冷战，只是想在不引发大规模冲突的前提下，从中国获得更多利益而已，而中国对美也仍然以合作为主。^⑤赵可金认为，中美无法发生新冷战，因为当今时代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争夺软实力的“软战时代”，以硬实力为基础的冷战过时了。^⑥张文木强调，“冷战”是一个制造出来的概念，用来反映苏美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而当前中美竞争的本质是制度竞争，即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妨碍了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为获得军火美元而发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美国会很快对华“摊牌”，但中国还是不能接受“新冷战”这个口号，以免将“垄断帝国主义”的美国与“民族国家”的美国混为一谈，进而令自己站在整个西方和利坚民族对立面，即四面树敌。^⑦

① Richard Fontaine and Ely Ratner, “The U.S.-China Confrontation Is Not Another Cold War. It’s Something New,”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0/07/02/us-china-confrontation-is-not-another-cold-war-its-something-new/>.

② Nick Bisley, “The China-US Rivalry Is Not a New Cold War. It Is Way More Complex and Could Last Much Longer,” *The Conversation*, August 27, 2020,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china-us-rivalry-is-not-a-new-cold-war-it-is-way-more-complex-and-could-last-much-longer-144912>.

③ Guo Shuyong and Li Boran, “The Myth of the New Cold Wa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2, No.2, 2020, pp.6-13.

④ Wei Li, “Why Do We Need to Revisit the Cold War?”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No.2, 2020, pp.87-90.

⑤ 薛力：《中美关系的性质：“冷缠斗”而非新冷战》，《世界知识》2018年第21期，第73页。

⑥ 赵可金：《为什么新冷战是不可能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7期，第20—23页。

⑦ 张文木：《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兼析苏联后期的外交失误及目前“新冷战”概念的错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第4—12页；张文木：《新时代的中美变局与世界前途》，《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4期，第1—12页。

整体来看,参与争论的双方主要为政界、国际关系学界的专家与学者,而来自史学尤其是冷战史学界的声音相对较少。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第一,冷战与新冷战的比较仅限于一些简单的表象特征层面,基本特征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实际上,冷战从不同视角来看会呈现出不同特征。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冷战是“美苏在战时共同敌人基本消灭之后,为继续解决战后世界安排问题而进行的合作与冲突”。^①就表现形式而言,它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意识形态为主要武器、争夺地缘政治优势的斗争”。^②从战争与和平关系视角来看,它是“是一种埋藏着战争危机的和平状态,也是一种以和平形态表现的战争”。^③用危机管理理论来看,它是“由一连串小事件叠加起来而最终引爆的大危机”,^④等等。但若不进一步明确基本特征,就无法从根本上清楚鉴别新冷战是否已经发生。比如,如果将双方是否互视为对手作为标准来判断,就会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定位一直处于变化中,而中国对美国的定位没有改变。其中,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看成修正主义国家和最大战略竞争对手,蓬佩奥直接称中国为美国“最大敌人”,拜登政府删除了中国的修正主义国家身份,认为中国既不是伙伴,也不是敌人,而是“头号竞争对手”。^⑤与此同时,中国则一直表态要建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再比如,约瑟夫·奈认为,经济和生态上的相互依赖减少了中美冷战的可能性,“误算”则有可能给两国关系带来灾难。^⑥但实际上,经济相互依赖曾经被视为两国关系中的压舱石,而现在则成为中美纠纷的一个重大来源。理论上,也有研究表明广泛的经济相互依赖增加了军事争端的可能性,而极端经济相互依赖,无论对称还是不对称,都会最大可能增加冲突的发生。^⑦在全球治理领域,鉴于特朗普政府在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上的表现,外界很难相信以后的美国政府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会坚持一以贯之的合作方针。更何况,冷战所涉及的传统安全事务,其利益关系是零和的,未必能够被全球治理领域的非零和利益抵消。至于“误

①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

② 刘金质:《冷战史》(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12页。

③ 王帆:《关于冷战起源的几种解释》,《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第34页。

④ 冯玉军:《三份外交电报与“冷战”的起源》,《世界知识》2020年第15期,第75页。

⑤ 王文:《中美战略新定位与中国对美博弈策略》,《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4期,第37—38页。

⑥ Joseph S. Nye, Jr., “What Could Cause a US-China War,” *Project Syndicate*, March 2, 2021,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what-could-cause-us-china-war-by-joseph-s-nye-2021-03>.

⑦ Katherine Barbier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3, No.1, 1996, p.29.

算”问题，它难以用交流来解决，因为交流有可能带来互信，也有可能带来互疑，好比因为无知而一见钟情，因为理解而决定离婚一样。^①从历史来看，苏联还与纳粹德国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然而不久德国就入侵苏联。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冷战的起源受到严重忽视。不明确这一点和相应的必要条件，也就无法类比新冷战会不会发生。冷战史学界对它进行过大量研究，普遍认为比较复杂。仅在美国史学界，就有认为苏联首先挑起冷战的正统学派、美国首先发动冷战的修正学派以及美苏互动导致冷战发生的后修正学派这三种解读。^②中国冷战史学界则受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影响较大，倾向于认为冷战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③但是在国际关系和决策界，经常出现简单化理解这一问题的错误，当中美关系的某一个或某几个要素与冷战起源要素相似的时候，新冷战就被认为已经或即将发生。此外，在讨论中美新冷战时，国际关系学界提出的问题往往是中国是否对美国发动新冷战，或美国是否对中国发动新冷战，或中美是否相互发动新冷战，却没有联想另一个相关问题，那就是，如果美苏当年都不想发动冷战，冷战是否会发生。而冷战史学界就关注过这个问题，曾经有观点认为“冷战既不是苏联决策者也不是美国决策者制造的，既不是苏联的革命热情也不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必然结果。尽管冷战的参与者都不想要冷战，冷战最后还是发生了”。^④以此类推，所谓新冷战是否必然会发生同样需要引起重视，而这也只能从有关冷战的起源归溯中比较分析出结论。

凡此种种，都说明认识审视冷战的基本特征与起源，对于中美新冷战研究意义重大。接下来，本文将利用冷战史学界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先从冷战起源的角度探讨中美新冷战的可能诱因、抑制要素等问题，再从冷战基本特征和含义的视角比较分析中美是否处于新冷战状态，最后就当前中美关系现状的性质进行探讨。

二、概念的界定

在全面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一些概念进行界定。

① 阎学通：《总有人说中美的问题是缺乏互信，但其实都是利益考量》，观察者网，2020年8月18日，https://www.guancha.cn/YanXueTong/2020_08_18_561906_s.shtml。

② Thomas Taylor Hammond, *Witnesses to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6, pp.3-26.

③ 刘金质：《冷战史》（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558页。

④ 陶文钊：《关于冷战起源的新解释》，《世界历史》1998年第2期，第116页。

极。从历史文献来看，冷战之初美国主要从政治、心理、经济与军事实力视角，从核心价值观、国内政治、社会凝聚力、外交关系、国民生产总值、军费、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以及核武器数量等指标来看美苏两国力量对比情况。^①也就是说，它倾向于从软硬实力相结合的视角来定义极。二战结束之初，美苏还没有形成敌对关系，但是两极结构已经形成，原因是美苏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大国，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尽管这种结构是严重不平衡的。^②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极从结构的视角来看，指行为体的数量及其实力分配状况。^③而目前有关中美已经形成两极的认定，主要从国民生产总值、军费与数字科技发展水平（比如5G）这三个方面指标来衡量。^④鉴于相关软实力指标难以观测且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两极结构侧重关注硬实力对比，为方便比较，这里主要采用国民生产总值、军费、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与核武器数量等指标，其中核武器数量这一指标异常重要。因为它是两极格局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确保了美苏对抗没有引发热战，双方最多只敢进行代理人战争。基辛格坦言，冷战初期的国际秩序是“两个核超级大国之间的均衡”。^⑤尽管当时美国没有苏联核武器发展的具体情报，但当时只有美苏拥有核武器，而且美国注重评估苏联核武器的发展情况。而之所以排除科技发展（包括数字科技）水平这个指标，是因为二战后苏联整体科技水平不如美国，但这不妨碍两极结构出现。此外，两极结构不等同于两极格局，因为结构只包含实力对比，而格局则是由实力对比和战略关系这两个要素组成。^⑥二战结束之初，美苏只是形成了两极结构，而两极格局则是美苏关系全面走向敌对也就是冷战正式爆发后才形成的。

冷战。它简单说就是“不直接用枪炮的对峙”，^⑦含义有三层：“资本主义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与冲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斗争”，

① 《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规划》，参见周建民、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1—103页。

② 刘金质：《冷战史》（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3—24页。

③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122页。

④ 赵华胜：《中俄美关系与国际结构：从多极到两极？》，《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4期，第4—7页；阎学通：《数字时代的中美竞争》，《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第30—31页。

⑤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369页。

⑥ 阎学通、何颖著：《国际关系分析》（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0—51页。

⑦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20页。

“美国以及盟友同苏联以及盟友的军事对抗、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及为争夺第三世界的角逐”。^①当然，冷战中这些斗争、对抗与冲突都是零和的，双方都没有退让余地。“大国以代理人战争方式在全球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战略竞争”^②这一界定从冷战史角度来看有较大缺陷。其一，代理人战争并非冷战双方互动的主旋律，它的频率并不高，冷战更多是一种“长和平”，^③更何况美苏之间也曾有数次军事对峙引起的危机，包括差点引发核战争的古巴导弹危机。其二，“双方在全球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界定掩盖了双方其他领域的竞争，更何况无论冷战前后意识形态扩张都不是双方唯一或最高目标。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于希腊和中国革命就持消极态度，其中制止中国革命维护苏联在远东的其他利益被放在更重要位置。^④也有研究指出，美国实际上遏制的是苏联的权力而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1948年，南斯拉夫同苏联决裂后，美国对前者提供了军事援助，这明显出于均势考虑。^⑤事实上，基于同样理由，尼克松政府抛弃了意识形态成见，在20世纪70年代选择了与社会主义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政策。

冷战的基本特征是“战后美国和苏联把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的阵营，并把两极结构强加给整个世界，主宰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⑥它是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霸权而进行的对抗并由此而带来的世界分裂，只要对抗和分裂形成，冷战也就产生了。当然，这种对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抗，而是为生存进行的殊死较量。这种分裂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分裂，而是政治、经济与价值取向上的完全脱钩。甚至，两大阵营的对抗和分裂还导致了某些第三方国家陷入不得不选边站，否则其生存和发展就会无法得到保证的困境，20世纪60年代的古巴就是典型例子。

三、“冷战”的起源

虽然冷战的起源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并非某个单一理论所能解释，但仍有可能寻找到形成的基本动因与要素。这里采用中国冷战史学界的研究视角，使用体系、

① 刘金质：《冷战史》（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12页。

② 阎学通：《2019年开启了世界两极格局》，《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第6页。

③ 参见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

④ 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47—51页。

⑤ 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十版），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7页。

⑥ 刘金质：《冷战史》（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13页。

国家和人这三个层次的分析方法进行梳理。

第一，国际体系权力真空与混乱为两极结构下的冲突与对抗提供了足够空间。

二战结束之初，经济上除了美国因战争而大发横财之外，其余欧亚强国都穷困潦倒。即便经过战后恢复，其他国家实力与美国也不在同一个层次，其中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1/3。按照1964年美元价格计算，195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为3810亿美元，苏联1260亿美元，英国710亿美元，法国500亿美元，西德480亿美元，日本320亿美元，意大利290亿美元。在军费和军队数量上，除了苏联外，其他国家完全失去了与美国争夺地位的可能。1950年美国的军费和军队数量是145亿美元、138万人，苏联155亿美元、430万人，英国23亿美元、68万人，法国14亿美元、59万人，意大利5亿美元、23万人，德日则被解除武装。^①

战争和经济衰败让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影响迅速扩大。除了被苏联占领的东欧外，西欧的左翼力量也迅速壮大。苏联被视为欧洲解放者，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国民心目中形象积极正面，比利时、荷兰、希腊、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共产党员数量剧增。1945年法国、芬兰和意大利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数达到了全国的20%。^②1945年底意大利共产党数量有170万，1946年法国共产党数量超过了100万，它们还都参加了战后联合政府。1945年，匈牙利共产党数量由几百人上升到50万人，而自当年5月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数量更是由2.8万人上升到120万。需要指出的是，这两国共产党的壮大很难说与苏联的影响有充分关系。在南斯拉夫，铁托领导的共产党更是凭一己之力解放了国家。不仅如此，铁托还对意大利里雅斯特（Trieste）提出了领土要求，支持希腊共产党，并于1946年8月击落了美国两架运输机。^③1946年2月，德国共产党人为国家统一开始斗争，他们在东德胜券在握的情况下，努力争取西部占领区支持。^④就此，欧洲诸多国家由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并与西方分道扬镳的可能性已经不再停留于假设层面。

①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下），王保存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92—104页。

② 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7页。

③ David Reynolds, "The European Dimension of the Cold War,"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David S. Painter, eds.,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p.168.

④ 梅尔文·P. 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02页。

二战还令传统殖民主义受到严重削弱,广大亚非拉地区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浪潮。在中国、朝鲜、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印度支那和马来亚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共产党积极参加和组织反日运动。在南亚次大陆、中东、北非和拉美等地区,当地的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得到壮大。战后,凭借已经积累的力量,它们积极反对外国经济政治控制、推动民族自决与国家独立,其中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最为瞩目。对此,英、法、荷等老牌殖民国家虽不情愿,但因实力所限,无法单靠自己解决问题。^①不仅如此,在亚非拉诸多国家内部,战争教育了大众,鼓舞了没有权利的人,刺激了新民主学说的诞生。随着不同阶级、集团和派别争夺权力并在国内外寻找盟友,这些国家内部同样风云激荡。^②它们都为美苏介入提供了充分条件。

第二,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冲突不可调和令美苏走向对抗。

杜鲁门政府的决策者相信权力由一国经济能力决定,在持久冲突中经济能力会决定军事斗争结果。二战后,当美国经济实力无可匹敌之时,其经济利益也遍及全球。其中,维持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至关重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就是其中代表。马歇尔计划的重要目的是将欧洲经济与美国捆绑在一起,方便美国获取海外市场和原材料,扩大美国出口,防止美国经济萎缩。不仅如此,美国还意识到将欧洲日本核心工业区与亚非欠发达地区融为一体的重要性,马歇尔计划甚至有着为西欧殖民地提供援助的内容。与此同时,苏联与诸多东欧国家签订双边经济协议的行为被美国视为威胁。原因是,一方面它有助于苏联利用当地资源壮大自己发展武力,西欧的经济形势则因无法获得来自这些国家的急需商品而恶化。另一方面,双边协定本身会把世界分割成诸多孤立的经济集团,可能会诱使更多弱国小国倒向苏联,诱发西欧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③苏联则认为自己可以自给自足,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马歇尔计划,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彻底站在了美国经济的对立面。^④

经济利益对立必然会加剧政治安全领域的对抗。在欧洲,美国和苏联都担心德国

①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37—281页。

② Leslie Bethell and Ian Roxborough, “The Impact of Cold War on Latin America,”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David S. Painter, eds.,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p.299.

③ 梅尔文·P.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60—174页、第497页,引言第6—9页。

④ 沈志华、张昕:《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沈志华教授访谈》,《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1期,第3—22页。

再次崛起或者倒向对手。在亚洲，美国独占并统治日本，拒绝苏联占领和管理日本，斯大林则担心日本复兴对苏联安全的可能冲击。^①美国决定将西德纳入西欧经济区，重整其经济军事。美国官员认为，德国军队和工业对于保护欧洲至关重要。^②为此，美国实质性推动成立西德政府，发行新货币，实施西柏林市政选举。苏联则与之针锋相对，封锁柏林水陆交通，发行东德马克。美国接着对苏联又采取了反制措施，第一次柏林危机就此爆发。危机结束后，德国分裂，分别加入两大阵营，欧洲两极格局随之形成。^③在亚洲，美国先是扶持国民党政权，然后又想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制造分裂。中苏结盟后，美国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联威胁，日本、朝鲜半岛、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对美国的战略意义随即凸显。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认为中苏是幕后黑手，迅速决定介入战争，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单独与日本媾和，冷战在亚洲的格局也由此定型。^④

第三，意识形态对立、文化心理认知差异强化了苏美决策层的恶性互动。

意识形态强化了美苏在经济、政治与安全等领域的对抗，并为双方的冷战政策披上了合法性外衣。二战结束后，美国加大了全球意识形态攻势。在对外宣传中，它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共产主义对立面呈现，将美式价值观作为制定国际行为准则的指南，在对外援助中以意识形态划线，以自己的理念改造战败国和占领地，针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进行意识形态的国际广播心理战。^⑤1948年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0/4号文件指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苏联的行为表明，苏联领导人的最终目的是要摧毁这个世界。”“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为险恶的威胁源于苏联的敌对意图和不容忽视的实力，也源于苏联制度的本质”。^⑥在苏联看来，两次世界大战都由邪恶的帝国主义发动，西方意识形态是欧洲未来和平稳定的威胁。西方国家的理念和行为之

① Melvyn P. Leffler,《冷战是如何开始的》，陈兼、陈之宏译，《冷战国际史研究》2004年第00期，第106—107页。

② 梅尔文·P.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86页。

③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89—102页。

④ 沈志华、姚昱：《美国对中苏结盟的反应与亚洲冷战格局的形成》，《北大史学》2012年第00期，第266—297页。

⑤ 刘金质：《冷战史》（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9页。

⑥ 《国家安全委员会致总统》，周建民、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7页、第30页。

间存在明显落差，对外奉行双重标准，也令苏联认为西方有自私自利的虚伪本性。^①

斯大林的权力政治观有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二战末期苏军走向胜利之时，他就私下透露“每人都在其军力可及之处，建立其制度，绝没有例外”。他本人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在本质上没有差异，觉得理想的国际秩序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化泛斯拉夫主义”。^②对于二战胜利，斯大林没有表示出快乐。出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解，他认为一场新资本主义危机将在10～15年内爆发，一次大国战争必然会于未来15～20年再爆发。而苏联应考虑，是利用战后美国资本必定要输出的机会获得经济援助争取复兴，以便在大约15年后与资本主义的下一轮冲突中占据有利地位，当然这个目标也一定会实现。^③

二战结束之前，罗斯福个人包办了美国外交，他不认为苏联的意识形态会影响美国与之合作。对于斯大林的猜疑性格，罗斯福采取了包容策略，他期望它会随着战后西方“在塑造未来和平方面使苏联成为一名充分的伙伴”而逐渐消退。不仅如此，他还特别重视建立与苏联领导人的互信关系，试图用个人魅力去和斯大林沟通。^④罗斯福去世后，继任的杜鲁门总统作风率直，认为极权主义政治体制决定了苏联和纳粹德国本质相同，也担心苏联会继承以往俄罗斯的扩张传统。他本人对外交知之甚少，决策主要依靠身边的外交顾问，但这中间有一批反共反苏的强硬智囊。不仅如此，斯大林和杜鲁门都难以抵制自己所认为的“机会”诱惑。斯大林觉得计划经济体制不仅能够令苏联战胜德国，也会让苏联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获得优势。与此同时，杜鲁门则考虑用美国核优势和经济力量赢得与苏联的国际政治对抗。^⑤尽管二战结束之初，两人都在考虑合作的可能，不愿意看到也很有可能没有预见到冷战爆发。杜鲁门在1946年底还在努力延续罗斯福的既有方针，没有制定出新的对苏战略，到1949年还把斯大林

① 迈克尔·内伯格：《1945：大国博弈下的世界秩序新格局》，宋世锋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第33—34页。

②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第391、411、433页。

③ 迈克尔·内伯格：《1945：大国博弈下的世界秩序新格局》，宋世锋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第99页；小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十版），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4页。

④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9—14页。

⑤ Melvyn P. Leffler，《冷战是如何开始的》，陈兼、陈之宏译，《冷战国际史研究》2004年第00期，第111页；理查德·克罗卡特：《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1）》，王振西、钱俊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6页。

比作自己的老朋友。^①

文化心理认知差异令美苏两国在外交层面产生了诸多误解，强化了对彼此的负面立场。1945年4月23日，刚上任不久的杜鲁门第一次与苏联高级官员、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就有关波兰争议问题进行了一场谈话，语气非常严厉。事后，虽然美国方面没有认真考虑过苏联方面的解读，但在后者看来，这次会谈却“意味着与西方合作时代的终结”，美国有了新政策，即视苏联“为敌人或对手，而非伙伴”。^②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Leffler）指出，苏联最具挑衅性和最难应对的外交政策行动都是“对西方国家首先采取的行动做出反应”。^③与此同时，苏联虽然在处理对西欧特别是对美关系时小心谨慎，但却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在势力范围内强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二是将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纳入国际共运范畴。尽管其初衷是防御，但却激化了矛盾。其中，将朝鲜按照斯大林模式打造成自己的卫星国以及与中国结盟超出了雅尔塔体系范畴，引起美国有关它想要在亚洲扩张的猜忌。^④基辛格曾经认为，斯大林太不了解美国的心理，一些政策“玩火过头”，因为“一旦美国人认为他的信誉已经扫地，就不可能再相信他”。^⑤

四、中美难以进入“新冷战”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中美关系远没有达到冷战程度。冷战正式开始是以德国分裂和朝鲜战争爆发为标志，之后苏美才正式走上对抗之路。当前中美之间的经济战、科技战、意识形态战和军事较量，就烈度和对世界的影响而言，与以上两大事件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回溯冷战起源可以看出，国际体系变化重新塑造了美苏两国国家利益，双方领导人对国家利益和彼此的认知随之变化，两国的外交战略与政策也相应转型。在经济利益冲突无法缓和的情况下，美苏加剧了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对抗，意

① 小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十版），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4—175页。

② 迈克尔·内伯格：《1945：大国博弈下的世界秩序新格局》，宋世锋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第55—57页；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上卷），李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51—52、76—90页。

③ 梅尔文·P.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515页。

④ 沈志华、余伟民：《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14页。

⑤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第439—440页。

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认知差异又强化了双方决策层敌意。在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不敢发动热战的情况下，冷战顺应产生。这其中，经济利益冲突是决定性变量，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认识差异扮演了催化剂角色。与此相比，所谓“新冷战”的各起源要素发育远不充分，发育完成的希望也很小，因此中美难以进入新冷战。

首先，两极结构并未形成，国际权力真空极小。

从综合实力对比来看，中国只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军费总额上能够和美国一样甩开其他大国较大距离，而在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核武器数量等方面没有达到相应水平，因此两极结构并未形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2.9万亿美元，占世界的24.2%；中国为16.8万亿美元，占世界的17.8%；排在第三位的日本是5.1万亿美元，占世界5.38%。^①在军费方面，2020年美国为7782.32亿美元，中国为2523.04亿美元，第三名俄罗斯为617.13亿美元。^②这两点上其他大国确实无法做到与中美并肩。

但是，中国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于其他大国并不高。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军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中国是1.7%，日本是1.0%，澳大利亚为2.1%，俄罗斯为4.3%，法国为2.1%，德国为1.4%，英国为2.2%，意大利为1.6%，加拿大为1.4%。^③中国军费整体支出不但只有美国的1/3，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不到美国的一半，甚至低于美国好几个盟友，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排名最后。这与1949～1950年间苏联在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严重落后美国的情况下军费总额却超过美国，且占国民生产总值13.8%的比重远高于美国的6.5%和欧洲北约成员国的4.8%，形成了鲜明对比。^④在可预见的将来，除非大规模战争爆发，否则中国仍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可能明显增加。从中也可以看出，以上绝大部分国家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

① “Projected GDP Ranking,” October 26, 2021, <https://statisticstimes.com/economy/projected-world-gdp-ranking.php>.

② “Military Expenditure by Country, in Constant (2019) US\$ m., 1988-2020,” <https://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Data%20for%20all%20countries%20from%201988%E2%80%932020%20in%20constant%20%282019%29%20USD%20%28pdf%29.pdf>.

③ “Military Expenditure by Country as Percentag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988-2020,” <https://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Data%20for%20all%20countries%20from%201988%E2%80%932020%20as%20a%20share%20of%20GDP%20%28pdf%29.pdf>.

④ 《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规划》，周建民、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0—71页。

的比重都在2%左右，连最高的俄罗斯都低于当年欧洲北约成员国的水平，这还是在它面临欧洲军事斗争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这同样说明，大国认为彼此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概率比较低，不倾向于牺牲经济发展搞军备竞赛。

中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仍维持在较低水平。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2021年1月美国拥有核弹5550枚，俄罗斯6255枚，中国350枚，其余拥核国家都在300枚以下，其中法国290枚，英国225枚。^①某种程度而言，只要有了核武器，国家就拥有了在国际体系中生存与自主决定外交政策的资本。即便是朝鲜这样的小国，在拥核后美国也不敢像对待伊拉克和叙利亚那样对其攻击，重要原因就在于此。目前，世界公认的核武器超级大国只有美国和俄罗斯，中国不是其中一极。即便降低标准，中国也只能算五极中的一极。鉴于中国一贯以来奉行自卫核防御战略和不参与核军备竞赛政策，短期内大量增加核武器的可能性也不大。^②此外，美国当时在冷战有关军事力量的界定中，忽略了军队实战能力这个指标。因为当时经过二战洗礼，美苏两国在这点上处于同一位置。而今，中国军队在这点上与西方国家以及俄罗斯相差甚远。

中国不倾向大比例增加军费并扩充核武库表明了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全球军事主导地位，无法成为类似美苏“两极”结构中的“一极”。不仅如此，欧美国家在内部所要应对的最大思潮威胁是民粹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复苏的迹象，世界没有大范围权力真空可供争夺。与此同时，大国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塑造势力范围的霸凌行为也越来越不得人心。在气候变暖和新冠疫情等非传统安全议题越来越突出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更是把携手解决治理危机、共同脱困视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不希望冷战发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强调，世界不应该为中美对抗所主导，无论这二者在世界中的分量有多大。^③因此，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主流，二次冷战爆发的整体国际环境并不存在。

① “World Nuclear Forces,” <https://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and-disarmament/nuclear-disarmament-arms-control-and-non-proliferation/world-nuclear-forces>.

②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9年7月24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9-07/24/content_5414325.htm。

③ “World Should Not Be Dominated by US-China ‘Rivalry’, Macron Tells UN,” *France 24*, September 22, 2020, <https://www.france24.com/en/20200922-live-trump-xi-macron-address-virtual-ungeneral-assembly-from-afar-amid-pandemic>; Ido Vock, “Why Tensions Remain between Joe Biden and Emmanuel Macron, despite Their Warm Body Language,” *The New Statesman*, June 12, 2021, <https://www.newstatesman.com/world/g7/2021/06/why-tensions-remain-between-joe-biden-and-emmanuel-macron-despite-their-warm-body>.

其次，中美经济、政治与安全层面利益冲突并非不可调和。

中美之间虽有经济纠纷、竞争与对抗，但它们所涉及的是发展权之争，与国家生死存亡无关。当前和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全球统一经济体系已经形成，中国和苏联的一个重大差别是苏联游离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而中国则深度融入其中。美国对苏联冷战的重要目标就是控制世界主要资源产地，获得充分的商品销售市场，因为二战后美国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满足战时迅速膨胀起来的生产力需要。^①而今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美国已失去了为以上目标而发动新冷战的动力。更何况，当前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金融资本过于强大和产业空心化，这无法靠挑战中国来解决，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的失败就是例证。与此同时，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可能回归计划经济体制，只会更加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如果真有冷战意味，那么美国应该利用中国对石油的依赖，威胁切断中国与产油地之间的联系。但实际上美国非但没有这样做，还加大对中国原油出口。截至2020年9月，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四大原油进口来源国，在中国原油进口中的比例高达7%。^②与此同时，中国应该利用美国高度依赖中国对美债券的投资，给美国制造财政难题，但中国没有如此选择。截至2021年10月，中国购买美国国债1.07万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是美国第二大国债购买国。^③此外，中国还可以利用美国在战略资源稀土上对中国的高度依赖来威胁美国。仅2015～2018年，美国80%的稀土就进口自中国。^④但即便在中美贸易战正酣之时，中国也没有这样决定。

不仅如此，中国市场超强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还为美国所青睐。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2.16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9%，中国成为新冠疫情导致全球贸易大幅萎缩背景下货物贸易正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⑤2020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

① 朱明权：《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② 彭强：《美油进口再创新高，美国成中国第四大原油进口国》，界面新闻网，2020年10月27日，<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175046.html>；Benoit Faucon and Collin Eaton, “U.S. Boosts Crude Sales to China, Forcing Saudis to Find Other Markets,” October 5,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boosts-crude-sales-to-china-forcing-saudis-to-find-other-markets-11601895481>。

③ “Major Foreign Holders of Treasury Securities,” December 15, 2021, <https://ticdata.treasury.gov/Publish/mfh.txt>。

④ “An Overview of Rare Earth Elements and Related Issues for Congress,” November 24, 2020,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6618>。

⑤ 《2020年我国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 同比增1.9%》，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1年1月15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1/15/content_5580075.htm。

总值为4.06万亿美元，增长8.8%。其中，中国对美出口3.13万亿元，增长8.4%；自美进口9318.7亿元，增长10.1%。^①2021年头5个月，美国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总值为1.82万亿元，增长41.3%，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12.3%。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1.34万亿元，增长38.9%；自美国进口4783亿元，增长48.5%。^②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表示，对中国的出口使美国几乎所有的州和行业都受益，有“83%的美资企业将中国视作其全球战略中最重要或前五重点之一”。^③因此，当前美国出现了政府打压中国而企业却忙于经营中国甚至还游说政府放松对华经济制裁的奇特现象，这是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中绝不可能出现的。

在政治和安全层面，中美没有同时涉及双方核心利益的重大直接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放弃了对外输出革命的政策，更没有计划逼迫他国仿效中国模式建立政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奉行多边主义，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平等对话。在中国周边地区，已不存在还有所谓战败大国被中美分裂对峙的可能，中国坚持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也决定了不会有周边国家与中国结盟对抗美国。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它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会遭遇中国及其联盟的大规模进攻的忧虑不会变成现实。中国没有将东亚视为自己后院的想想法，没有在亚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意图，美国相应利益也就不会受到威胁。朝核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台湾并非美国核心利益问题，且由于中国划出了红线，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将是有限度的，难以公开支持“两国论”。美国以反华著称的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都清楚美国在台湾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过度挑衅以至引发冲突。^④在南海，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无法实质性改变南海地区安全格局，并且目前相关争端方都不想美国卷入，遑论以军事方式。早在2018年8月，东盟与中国已经就“南海行为准则”的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达成一致。在2020年中印边界冲突中，印度同样拒绝了美国干

① 《海关总署2020年全年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站，2021年1月14日，<http://fangtan.customs.gov.cn/tabid/1106/Default.aspx>。

② 《海关总署：今年前5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14.76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28.2%》，凤凰网，2021年6月7日，<http://finance.ifeng.com/c/86sOmvW6hBa>。

③ 吴宇、王婧媛：《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华出口使美几乎所有州和行业受益”》，新华网，2021年5月27日，http://sh.xinhuanet.com/2021-05/27/c_139971767.htm。

④ 熊超然：《卢比奥：台湾是大陆的“红线问题”，美国需谨慎处理避免冲突》，观察者网，2020年9月24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0_09_24_566274.shtml。

预。^①在涉及美国核心安全利益的后院拉美，中拉合作以经贸与非传统安全合作为主，中国在拉美地区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对美国安全构成任何威胁。

再次，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差异上的认识问题不是无解。

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差异没有对彼此造成生存威胁。对于美国的意识形态攻势，中国在国内采取了扎紧篱笆的政策，通过一系列举措让自身意识形态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随着中国实力的日渐增长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改善，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更加坚定，更加不担心被外界颜色革命影响。在国际社会，中国对于美国的意识形态攻势采取了不接招政策，没有煽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对立。中国更没有采取类似苏联那种试图通过建立共产党情报局，控制其他国家共产党，来实现对抗“帝国主义阵营”的做法。^②在政党交往中，中国共产党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③即便是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相关的活动，中国共产党也主张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④在国家交往中，中国同样没有输出意识形态。“当前东南亚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乃至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确没有感觉到中国的意识形态在以任何方式威胁它们”。不仅如此，世界人口最多的三个民主国家中，相对于美国（3.3亿），印度（13亿）和印度尼西亚（2.5亿）尽管因为距离不远、联系更多而非常熟悉中国，却没有感受到中国的意识形态威胁。^⑤对于西方国家在新冠疫情中遭受的惨重损失，中国政府没有幸灾乐祸、借机在国际社会批判西方价值观，而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以守望相助的精神给予了它们帮助。

中美两国的各种对话机制虽然已经中断，但中国高层致力于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决心不变。中国政府虽然一直批判美国政府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与

^① Liu Zhen, “US Role Rejected as India and China Vow to Resolve Border Dispute Themselv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4, 2020,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87435/us-role-rejected-india-and-china-vow-resolve-border-dispute>.

^② 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83页。

^③ 杨依军、郑明达等：《东方风来春色新——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推动党的对外工作开创新局面纪实》，《人民日报》2021年1月17日，第1版。

^④ 《习近平向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讨会致贺信》，《人民日报》2021年5月28日，第1版。

^⑤ Kishore Mahbubani, “Can a Planet in Peril Contain Geopolitical Rivalries?” *Global Perspectives*, Vol.1, No.1, 2020, pp.4-7.

伪多边主义等，但总体上对美国持包容态度，视美国为队友而非对手。^①对于美国施加的种种制裁措施，中国的反制都是克制的，没有蓄意恶化的事态。在中国国内，反美主义没有成为思潮。在双边场合，中国对美国发出的外交信号坚定而清晰，回应也很及时。美国方面，虽不乏有坎贝尔（Kurt Campbell）那种声称对华几十年的接触时期已经结束的声音，但总统拜登仍表示两国应该避免冲突，双方可以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坦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避免误解误判。^②实际上，鉴于当前的国际形势，由于中国没有挑战美国根本利益的动机，比如将另外一个大国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支持其他国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等，美国对华战略误判的几率要小得多。

虽然经济上的深度相互依赖不一定能够避免新冷战的爆发，但是利用在这种相互依赖中受益群体的声音能够有效缓解对方担忧，促进和解与合作。^③中国显然重视这方面工作。2021年4月2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会见上海美国商会一行时，就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表示欢迎美国企业积极参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进程。对方则回应称将继续致力于对华投资，推动两国对话合作，这无疑是积极信号。^④

五、中美处于“类冷战”的战略竞合期

从前文分析中同样可以看出，当前中美关系的内容也不符合冷战的含义。中国没有盟友，无意与美国在国际上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不想和美国比较国家制度的优劣，与美国的军事关系没有达到集团对峙程度，更不存在同美国争夺第三世界的问题。当前中美关系的真正问题在于，美国在经历自由主义霸权的过度扩张、相对衰落之后，内政外交已现颓势，难以接受、也无法自信地面对一个在经济实力上即将超越自己的中国。“美国在处理具有安全自助能力的大国关系时，具有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和地

① 乐玉成：《中美选择合作，一切皆有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1年1月28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2101/t20210128_7946343.shtml。

②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12日，第1版；Russell Flannery, “End of ‘Engagement’ Won’t Lead to U.S. Business Exit From China,” *Forbes*, June 6, 2021, <https://www.forbes.com/sites/russellflannery/2021/06/06/end-of-engagement-wont-lead-to-us-business-exit-from-china/?sh=3bd42fd82533>。

③ 查尔斯·库普乾：《化敌为友：持久和平之道》，宋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0—81页。

④ 《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会见美国工商界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1年4月25日，https://www.fmprc.gov.cn/wjbxw_673019/202104/t20210425_9137951.shtml。

缘政治思维，无论这种思维体现为以军事为主的硬制衡，还是以国际经济规则为主的软制衡。”“何况，中美之间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分歧很大，美国精英阶层担心中国未来在制度和领域成为美国的竞争者甚至挑战者”。^①近年来，美国对新疆人权的造谣污蔑就是典型表现。不仅如此，在美国对外战略思维中，出于安全焦虑而寻找敌人是常见现象。它自我理想化，把本国利益的优先性定义为与一系列妖魔无休止的正面交锋，而不试图理解对方行为与政策里的任何合理因素，夸大敌方意图的不妥协性、长远性与威胁性。^②从目前来看，王缉思和李侃如曾经提到过中美关系中的战略互疑问题很多还没有解决，其中一些甚至恶化。比如，美国不信任中国一党执政制度、认定中国利用网络盗窃美国技术、妨碍美国公海行动自由，中国则怀疑美国企图破坏共产党领导、阻止台海两岸统一、牵制甚至阻碍中国崛起，等等。^③对此，两国高层虽一直保持沟通，但都是在各自表达立场，未就核心议题达成共识。

整体来看，中美两国正处于“类冷战”的战略竞合期。它的负面色彩比较突出，虽不具备冷战意味，也难以发展成冷战，却沾染了冷战的硝烟。新冷战暂时不会发生并不意味着冷战思维不会延续，也不意味着中美之间没有对抗、冲突乃至局部战争的风险。美国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坦言，“美国内部正将中美关系视为零和的经济军事斗争，这种迅速发展的共识令人沮丧且十分危险。它的弥漫将会营造一个令合作愈发难以实现的政治环境，而合作恰恰是当今世界迫切需要的”。^④中美关系还没有到最坏的时候，也许几年后回过头来看，目前是中美关系最不坏的时候。布林肯在提出对华政策时表示：“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将会是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能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其共同特征是从实力的角度与中国接触。”^⑤从拜登政府执政思路来看，它实际上选择的是在不得不合作的地方合作，能竞争的地方竞争，可以对抗的地方对抗。当然，它也小心翼翼控制竞争与对抗烈度，以防反噬自己在中国的诸多利益。短期而言，无论拜登政府真实想法如何，它暂时都无法走出特

① 张宇燕、高程：《美国行为的根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64页、第174页。

② 保罗·皮拉尔：《美国为什么误读了世界》，脩远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9年，第206页、第230—231页。

③ 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0330_china_lieberthal_chinese.pdf。

④ Bernie Sanders, “Washington’s Dangerous New Consensus on China,” June 17, 2021, <http://cn3.uscnpm.org/Uploads/kindeditor/file/20210619/No%20New%20Cold%20War%20with%20China.pdf>。

⑤ Antony J. Blinken,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3, 2021,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朗普政府对华过于强硬的阴影。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分裂将会成为影响它对华政策的核心变量。难以确定在反建制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美国全球外交战略和它的对华政策会出现什么样的灰犀牛现象。相比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言辞要理性很多，但这并不妨碍它在一系列议题上延续与强化对华对抗的政策。与此同时，中国虽然愿意包容美国，但不会屈服于实力的威逼和强加的规则，更不会容忍美国肆意侵犯自己底线。因此，虽然在经济、核不扩散以及全球治理等层面两国能够大体维持合作局面，但随着两国关系中消极因素的积累与释放，双方负面竞争色彩会更加浓厚，在局部问题上会有出现危机甚至冲突的可能。

美国会继续努力将中国经济限制在大而不强的范围内。首先，对华经济技术和资源的“有限脱钩论”在美国广有市场，“小院高墙”式精准对华封锁政策受到青睐。^①中美贸易摩擦的烈度没有减轻迹象。拜登政府正在组建“供应链同盟”，试图在一些关键资源和技术上联合对华脱钩。拜登政府也没有取消特朗普时期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制裁政策，一些制裁措施甚至强化。6月8日，美国参议院更是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计划投入超过2500亿美元在芯片、机器人和稀土金属等领域与中国脱钩。对此，英国《泰晤士报》网站认为美国在走去全球化道路。^②其次，美国非但没有放松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限制，而且加大在海外投资上与中国的竞争力度。拜登上台后，开始谋划建设“民主国家”版本的“一带一路”计划。当然，它声称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按照西方的“高标准”和“透明度”来建设。^③

无论在非传统安全还是传统安全议题上，美国对华施压力度都在加大。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美国仍在将新冠疫情的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传统安全议题上，中美军事博弈的力度在加大。美国国防部成立了中国工作小组，专门评估与中国相关的政策、行动、情报并提出政策建议，以便它能够以全政府方式，组织好国内外力量应对中国。^④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Kathleen Hicks）称，中国对美国构成了真实持久的挑战，美

① 安雨康：《对华“有限脱钩”论在美国甚嚣尘上》，《世界知识》2021年第8期，第60—61页。

② 《英媒文章：美国打算走全球化回头路》，参考消息网，2021年6月14日，<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21/06/14/2445946.shtml>。

③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Launch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 Partnership,” The White House, June 1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launch-build-back-better-world-b3w-partnership/>。

④ “Secretary of Defense Directive on China Task Force Recommendation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9, 2021, <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Releases/Release/Article/2651534/secretary-of-defense-directive-on-china-task-force-recommendations/>。

国必须阻止中国的进攻行动（aggression），盟友与伙伴在其中同样重要。^①2021年6月中旬，在首次参加北约峰会之际，拜登要求北约领导人抵抗中国的“集权主义”与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②在中国周边地区，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在增大。美国继续坚持《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对日本防务不动摇的承诺，确认支持“航行和飞越自由”，“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海事声索和活动”，重申所谓南海仲裁判决的有效性，并对中国的《海警法》表示严正关切。^③美军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运动继续，美军舰持续穿越台湾海峡。不仅如此，在美国煽动下，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和日本等国也相继派军舰在南海执行航行自由运动。^④

拜登政府正在加大利用多边机制挤压中国的力度。在多个国际场合，拜登政府主要官员反复强调中国是世界唯一有实力削弱或者挑战国际秩序及其价值的国家。拜登政府上台后，决定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协定》。其重要理由是，如果美国不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发挥领导地位，其权力真空就有可能被中国填补。不仅如此，拜登政府还特别注意联盟与伙伴的团结在对华战略中的作用，其高官在多个场合都强调要用集体力量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拜登政府将之前的美印日澳四国对话机制升级为四国领导人峰会。3月12日，其第一次领导人峰会公报的内容虽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但针对中国的寓意不言自明，比如强调民主价值观在亚太秩序中的作用，应对海上秩序挑战，加强关键和新兴技术合作，等等。^⑤四方机制还有升级为七方机制的可能，7月20日，四方机制成员国和韩国、越南、新西兰三国的副外长举行了第18次定期会议，讨论新冠疫情、数字经济和世界经济复苏方

① David Vergun, “Deputy Defense Secretary Says Conflict With China Is Not Inevitabl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ril 30, 2021,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2591598/deputy-defense-secretary-says-conflict-with-china-is-not-inevitable>.

② Sabine Siebold, Steve Holland, Robin Emmott, “NATO Adopts Tough Line on China at Biden’s Debut Summit with Alliance,” Reuters, June 15,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nato-welcomes-biden-pivotal-post-trump-summit-2021-06-14/>.

③ 《美日联合新闻声明》，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网站，2021年3月16日，<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u-s-japan-joint-press-statement-cn/>。

④ 《想用航母“秀武力”？美盟友都派哪些战舰来南海》，中国南海网，2021年5月7日，www.thesouthchinasea.org.cn/2021-05/07/c_619026.htm。

⑤ “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Spirit of the Quad,’” The White House, March 1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12/quad-leaders-joint-statement-the-spirit-of-the-quad/>.

案等问题。^①

6月13日，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联合公报再次强调西方价值观对于世界的意义，重提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中国海上周边安全再次受到重视，台湾问题更是首次提出。^②6月14日，北约领导人峰会联合公报称，“中国公开的雄心与强势行为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与联盟安全相关的领域构成了系统性挑战”。^③由此，拜登政府在亚欧大陆强化针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初见雏形。

美国对华舆论战攻势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力度相较特朗普政府没有减轻。有关“中国威胁论”，“战狼外交论”和“中国不负责任论”的声音在继续。更严重的是，拜登政府正试图在全世界范围内塑造民主与集权制度对决的舆论氛围。美国对华人文交流政策没有明显改善，双方的教育、科技往来仍处于比较困难的状态。美国继续借人权问题在香港、新疆议题上向中国发难。其中，2021年3月22日，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盟基于虚假信息，对中国相关实体与个人实施了单边制裁，这也是拜登上台后西方国家首次就人权问题对华协同制裁。美国继续在台湾问题上测试中国红线。2021年1月，拜登的就职典礼更是邀请了台湾代表，这开启了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来美国总统史无前例的行为。日常行动上，除了派遣官员、议员、军机进入台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以及对台军售等行为，美国将台湾问题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日益明显。与此同时，蔡英文政权也以“台湾站在世界民主阵营的前线”自居，极力为台独谋求国际空间。^④可以说，台湾问题上，美国正在采取“打擦边球”或“温水煮青蛙”式的灰色地带战措施对华极限施压，而且极有可能把握不住分寸，突破中国底线。

第三方问题引爆中美关系危机的可能性在提升。新冠疫情再次重创全球经济，国际秩序也在加速重组。虽然发达国家已经出现走出困境的势头，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在疫情中挣扎。由于全球疫苗短缺和新冠病毒不断变异，人类何时恢复正常秩序仍是未知数。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全球经济产业链运转不正常的情况下，局部地区必然

① 《韩美日等7国副外长开视频会商讨合作抗疫》，韩联社，2021年7月20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210720007900881>。

② “Carbis Bay G7 Summit Communiqué,” The White House, June 13,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3/carbis-bay-g7-summit-communication/>。

③ “Brussels Summit Communiqué,” June 14, 2021,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live/news_185000.htm?selectedLocale=en。

④ Oiwan Lam, “Taiwan,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 Not According to Taiwanese,” *GlobalVoices*, May 4, 2021, <https://globalvoices.org/2021/05/04/taiwan-the-most-dangerous-place-on-earth-not-according-to-taiwanese/>。

会出现动荡和危机，冲突和战争的种子还会孕育。虽然拜登政府想要战略收缩，但新冠疫情引发的国际危机极有可能诱惑美国再次对外军事干涉。与此同时，既有国际安全热点失控的风险也在加大。此时，不仅中国巨大的海外投资利益可能再次受损，“一带一路”沿线局部地区的建设也有可能中断，类似1999年中美炸馆事件的危机也有可能再现。在冷战思维作用下，这些问题会加大两国管控危机的难度，令双方关系进一步走向负面。

结 语

断言中美关系是否进入新冷战离不开对冷战史相关要素的考查与比较分析。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当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远没有达到冷战时期苏美对抗的程度，各种要素发育远不充分也决定了中美很难走向二次冷战。实际上，当前中国的军事战略只着眼于维持基本安全需要，不走扩张路线，军备发展适度，尤其是不盲目发展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两极结构不可能形成，新冷战自然无从谈起。整体来看，中美当前处于类冷战时期。展望未来，中美关系还有下行空间，双方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会提升。对于中国而言，只要崛起过程没有完成，来自美国的猜疑与打压都不会结束。对此，中国既不能为冷战思维所主导，陷入与美国对抗的恶性循环，也不能幻想退让能够让对手满足，进而令美国得寸进尺。唯有坚持以斗争求合作的路线，并逐步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战略合作输入正能量，中美权力转移才有可能平稳完成。更重要的是，从历史来看，“西方之所以赢得冷战是因为它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了一种优越的生活方式”，“国内体制和生活方式的生存能力”是国家根本，在长期竞争中社会健康对于国运则有决定意义。^①同样，对于中国而言，不为美国各种竞争的节奏主导，专心发展自己，保证人民福利与社会活力不断提高才是最重要的工作。

【收稿日期：2021-10-20】

【责任编辑：张志洲】

^① 梅尔文·P·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中文版序第xxiv页；时殷弘：《冷战的性质与其世界历史意义》，参见牛军主编：《战略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3页。